

“亲诚惠容”外交理念与中国国际传播的空间拓展

周小雯^{1,2}, 骆正林³

(1. 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江苏南京 210097;

2. 南京传媒学院新闻传播学院, 江苏南京 211172;

3.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江苏南京 210023)

摘要: 国际传播是促进公共外交和提升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手段。当前世界格局的底层逻辑正在发生变化, 中国国际传播面临诸多挑战, 也获得了难得的发展机遇。中国在开拓周边外交时提出了“亲诚惠容”的理念, 该理念不仅是中国外交的一个基本理念, 也为中国国际传播提供了理论源泉。研究从近年中国国际传播实践出发, 探究了“亲诚惠容”对周边传播的战略意义和对国际传播的空间拓展。认为“亲诚惠容”理念稳固了一带一路国际传播的成果, 在耦合机制、网络节点、主体符号、建设性力量等方面拓宽了中国的国际传播空间, 促进了中国主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关键词: “亲诚惠容”; 周边传播; 国际传播; 空间拓展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8418 (2025) 01-0015-11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在遭遇后疫情时代后, 世界发展充满不确定性。一些西方国家热衷于“小院高墙”, 打造各种封闭“俱乐部”, 尤其是21世纪以来以美国为首的新一轮逆全球化思潮泛起, 让人类社会的文明和发展面临一系列新问题和新的挑战。在零和博弈思维的主导下, 西方一些媒体推波助澜在国际传播中制造污名化, “国家安全”“民主人权”等成为道德批判和舆论攻击的幌子, 以此打压发展中国家的崛起, 也给中国的国际传播造成了许多新的困境。

2013年10月24日至25日, 中国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提出的“亲、诚、惠、容”的外交理念^[1], 成为中国在新形势下周边外交工作的标志性方针。作为代表中华文明的外交理念, “亲诚惠容”在提出的11年间不仅促成了更多国家间文明交流互鉴, 也成为指导中国国际传播从内涵向度到外延空间不断拓展的四字箴言, 显著改变了中国在国际传播中的不利地位。

一、冲突还是共存: 世界变局中国际传播的文明观

国际传播是国家软实力和公共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 世界变局中“碎片化”的国际乱象和“主观性”的报道议论进一步加剧加深旧有的国际格局和国际关系。如何跳脱霸权国家的传授逻辑和话语方式, 拓展国际传播新空间, 建立国际传播新秩序, 成为当今世界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的新支点。美国政治学家萨缪尔·亨廷顿 (Samuel P. Huntington) 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文明冲突论”一直饱受政界和学界争论, 将其作为“危险预言”和“冲突视角”。在批判之余, 探究其影响国际传播底色的文明观, 构建符合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传播理念才是国际传播的题中应有之意。

(一) 文明冲突论与美国霸权主义传播观

以东欧剧变与苏联解体为标志的冷战结束被公认为最近的一次世界格局调整。而在20世纪苏

联东欧局势动荡之时，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预言式地宣称“历史的终结”，意指冷战结束，世界大同，历史不再进化而就此终结。^[2] 亨廷顿认为，多元文明逐渐形成新的国际格局，后冷战世界最重要的冲突不再是意识形态冲突，而是一种文化乃至文明的冲突。^[3] 这个观点让福山“历史的终结”终结了，随着自由民主制度屡屡出现政治衰败，以及中国道路对美式民主的潜在挑战，福山继而又从政治秩序重新回到国家视角以回应亨氏的“文明冲突”，即政治秩序的构成要素在不同的文明中的发展脉络，是文明自身的政治秩序的现实表现。如次大陆获得一种以宗教信仰和社会实践为特征的共同文化，在尝试取得政治统一之前，就被标为与众不同的文明。^[4]

回溯“文明冲突论”学术起源必然带来更多元逻辑上的思考：文明的冲突是冲突的本源，还是冲突的表征？是不同文明国家和集团交往中的目标导向，还是自然结果？以美国的传播观为例，在美国达成霸权的目标过程中，除政治、经济和军事能力外，外交政策与国际传播成为其首要战略能力。这从美国政府不定期发布《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和俄罗斯描述为对美国构成威胁的“修正主义大国”就能看出，霸权传播的背后是美国将自己与世界所有地区的关系视为中心与边缘的等级关系。^[5] 如“修昔底德陷阱”“锐实力”无不在渲染中国威胁论和污名化他国，霸权主义导向下的传播观折射出充满煽动性、对抗性和异质性的文明观。这些更进一步说明了不同文明观念在国际交往和传播中不仅是应然的想象，还是实然的表现，成为影响多文明全球政治国际关系的逻辑底色。

（二）米勒的文明共存及其对国际传播的启示

在亨廷顿提出的文明结构论中，像部族和民族一样，各国依据地缘政治和文化认同成为文明成员国。作为成员国、核心国家、孤独国家、分裂国家或无所适从的国家，与各文明相联系。但

国际交往和国际事务中行为主体是国家，而不是非政治实体的文明成员国。透过文明的面纱，放下民主的旗帜，所谓文明间的冲突，更多是大国防止其他国家崛起或各国因权力财富分配不公而引起的争夺。而这些赤裸裸的冲突远远超过基督教、儒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冲突，也比文化差异与地理位置差异重合时的分离运动以及不重合时的种族灭绝和强制移民等规律性的预判更为精准。由此，文明成为一块掩盖霸权的遮羞布，一把游离在冲突与对话间的双刃剑。

德国学者哈拉尔德·米勒（Harald Miller）从文明共存的视角考察了当今世界发展大趋势，提出了文明分析的世界框架，即以“文明的共存”替代“文明的冲突”。他认为，亨氏将复杂的国际关系简单地套入“敌我对抗”，文明的冲突现象并非自然之力的结果，而是人为引起，人类完全可以依靠自身的力量来逾越这个障碍。^[6] 学者阎学通提到从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叙利亚战争到俄乌战争，细数战争各方的宗教信仰和文化特征，只能算是文明内部的冲突。而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以及美国国会暴乱等冲突事件，更多反映出的是民粹主义和逆全球化风潮。加之数字时代到来，与冷战思维强调意识形态威胁和地缘政治控制不同，数字思维已成为国际传播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7] 网络空间和数码地缘政治颠覆性地重新排列国际关系和文明结构，数字时代的文明碰撞可以成为开启对话的情感中介，能动的文明交流互鉴成为悬置争议的开端。

二、“亲诚惠容”理念与周边传播的战略构建

“理念”在哲学中有不同的认知阶段，柏拉图把关于理念世界的认识称为知识。^[8] 这也从某种程度上说明，一种理念的提出有其自身的历史逻辑。从历时角度来看，文明理念是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从结构关系上看，理念又嵌入“文化”这个有机联系的整体。^[9] 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关系中，“亲诚惠容”这一周边外交理念的提出，不仅体现了中国与邻国亲缘感情、坦诚相

待、互惠互利、包容发展的外交态度,且更多的是从思想情怀、文明观念的层面折射出中华文明和中国文化特点。

一种理念得以被国际社会知晓并认同,需要清晰阐明其核心观点,并在国际交往具体情景中因势利导,加以构建和传播。这是一个动态化的过程。在理念的分析视野中,由“亲诚惠容”文明内涵带来的传播战略思考,既是周边外交实践中的传播战术生成,又是统筹权衡的战略传播过程。

(一) 体现中华文明内涵的周边外交理念

“亲诚惠容”理念内涵起源于本土且一以贯之,是反复汇聚融合发展的原生性文化。中华文化始终体现出多元一体的格局风貌。一是多支祖先不断重组和各王朝更迭承转。中华民族的远祖可分为华夏、东夷、苗蛮三大文化集团^[10],后华夏集团胜利使得“华夏”成为民族历史称号,“皇帝”成为共同祭拜的人文始祖。从春秋战国再到秦始皇完成大一统后,“中国”的概念逐渐成型。二是多民族文化不断融合发展。北方游牧民族和南方农耕部落以及两汉后以汉族为主体,民族的兼和和迁徙频繁,少数民族也登上过统治的历史舞台,因此中华文明拥有较其他古老文明更为辽阔的发展腹地,为历史文化的多样化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11]三是对外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古代“丝绸之路”成为打通贯穿中亚,联结欧洲及北非的交通干线,中华对外文化交流从此拉开序幕。后敦煌作为河西走廊门户,聚集各国商贾、僧侣使不同背景的文化、宗教、手工艺品互相影响融合后回流传播至国内,为传统文化注入外来新鲜元素。

(二) “亲”“诚”形成周边传播的差序标尺

中国国际传播的首要任务和使命是构建并赢得一个和平发展的国际空间,而周边国家是中国生存发展的主要周边环境,因此对周边国家的国际传播建设是重中之重。中国自古便有“合纵连横”“远交近攻”的政治策略,虽然不是每个历史时期和条件下都适用,但都从地缘维度说明了

处理与周边邻国关系的重要性和复杂性。国际的关系除了涉及观念异同,还有现实利益、国家力量等多维度因素。在不同的关系和策略中,当前中国周边外交理念中的“亲”和“诚”成为国家交往和传播中的两把立体标尺,以“差序”结构秩序理念^[12],筑牢周边发展空间。

1. 以“亲”为地缘标尺的横向传播共同体

在中华文化中“亲”是指一种亲近关系和情感。放在国际关系中既指国与国地理位置上的靠近性,又指情感上的亲密性,构成了横向的“差”。溯源“亲”字始见于西周金文^[13],形声字,左边是“辛”右边是“见”,表示用眼睛常常见到。《礼记·奔丧》中有“始闻亲丧”一句,郑玄注曰:“亲,父母也。”徐灏《说文解字注笺·见部》曰:“亲,亲爱者莫如父子、兄弟、夫妇,故谓之六亲。”引申为凡切近之称。可见“亲”始于父母血缘,后又衍生到亲缘和姻缘关系,表意为感情深厚,关系很近。孟子曰:“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这是孟子阐发儒家仁爱思想的重要表述,从爱自己的亲人出发,推向仁爱百姓,再推向爱惜万物,这就形成了“爱的差序”。

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地缘共同体关系最远可以追溯到秦汉时期开辟陆上与海上丝绸之路,在扩大商品贸易、政治交往、文化交流中形成的儒家文化圈更是在亚太地区影响至今。当下中国共有14个陆地邻国,还有6个海上邻国,是世界上邻国数目最多的国家。元首外交足迹遍布东北亚、南亚、东南亚及欧亚等地区,仅2014年中国与东亚、南亚国家副总理以上领导人的互访及会见会谈超过110次^[14],疫情期间“15次同周边国家领导人通电话,10次致信函”^[15]及“一带一路”建设、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上合组织峰会、“中国+中亚五国”外长会晤机制、澜湄合作等。紧密联结不代表没有摩擦分歧,特别是美国加大对亚太地区的战略部署,增加了周边不稳定因素,而“亲”字放在“亲诚惠容”首位,在地缘上加固了与周边国家的紧密结构,形成横向传播

共同体。

2. 以“诚”为秩序标尺的纵向传播圈层化

“诚”不仅被视为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更是待人接物的道义标准，这种精神内核和秩序法则在国际关系中，构成了纵向的“序”。“诚”字始见于战国文字，古字形从言、成声。“诚”的基本意是诚实、真实。《尚书·太甲》中有“鬼神无常享，享于克诚”，这是“诚”字最早可以追溯的出处，表示对鬼神的虔诚，算是一种祭祀的宗教仪式和观念。《易·乾·文言》“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诚”开始体现出道德意义，强调君子要通过诚实守信之风来建功立业。到了《中庸》则有了更为经典的论述：“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中庸》以诚为天之道，认为天（自然）具有一种客观规律性。^[16]以古观今，以诚待人、以信取人是国家之间的相处之道。

中华民族在国家交往中历来重视诚信，也形成了以此为秩序的圈层结构。在古代中国皇帝对朝贡国的“回赐”价值通常高于贡品本身，即“厚往薄来”^[17]。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间交往始终秉持“信义之交”。进入新时期，随着中国国际地位上升和综合国力增强，更有实力倡导以“诚”相待与周边国家促合作共发展。如在 2010 年大选后的缅甸走上政治转型的进程中及次年发生的密松水电站事件中，中国政府信守不干涉别国内政的一贯立场；在南海问题、中菲和中越关系上实现了以诚消歧；就在 2023 年沙特和伊朗在中国帮助下恢复了双方外交关系，斡旋缅北达成停火协议，依靠的是双方乃至整个中东对中国的信任，这对国际社会起到了巨大示范作用。以“诚”为秩序形成了国际关系的圈层化和纵深性发展，是国际传播中对话交流的关键路径。

（三）“惠”“容”建立周边传播的韧性系统

加强中国周边传播，稳固周边外交和生存环境，除了形成共同体和圈层化，还需要从现实利益的角度出发，让中国发展成果惠及周边国家，加强经济贸易、项目合作这些国际关系的核心张

力，同时以求同存异，达成共识为国际关系进行柔性调适，以此构建更有效力的周边传播，实现传播效能的“全面提升”。中国周边外交理念中的“惠”和“容”分别从内在张力和外在柔性，有机形成了周边传播战略的韧性系统。

1. 以“惠”为诉求的内生扩张力

“惠”字始见于西周金文^[13]，本义指仁爱，许慎《说文解字》释“惠”为“仁也”，仁爱体现在行动上给人以财物或好处，指恩惠、好处。与儒家“义重于利”相比，墨家“兼相爱，交相利”的利益观和互利观表现得更加鲜明，认为交往需要对各方都有利处才能实现“天下治”。^[18]墨子“兼爱交利”的思想对中华民族影响深远，为古代东亚文明中心国与周边国家交流对话提供了逻辑参考，揭示出利益是国家间交往的持久动力，互惠互利的诉求也成为国际传播的内部张力。

我们面向的是一个多维的世界，存在着无数方向路径的可能。中国在全球化地缘政治变化中，国际地位明显提高，这与经济社会的发展密不可分。但长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通过一系列的措施渲染所谓的“中国威胁”，不断限制并打压如中国华为公司 5G 等产业的发展，干预中东国家使用中国的“5G”技术，巩固其霸权秩序。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推进，从过去中国更多向东向太平洋的发展路径，转变为向西发展，连接中亚、西亚和欧洲最终走向世界。“成为 15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对外直接投资连续 12 年居全球前三”^[20]，仅在 2018 年至 2023 年间中国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直接投资累计超过 1800 亿美元，以实际利益为战略内核是国际传播内在在稳定性的构成。中国古代的朝贡体制也是同样的战略逻辑，在朝贡体系影响下，东亚地区逐渐形成一个以汉字、儒家为核心的东亚文化圈。^[20]总之，周边传播的张力更多体现在“惠”和“利”等具体层面。

2. 以“容”为外部边界的柔性调适

“容”字始见于商代甲骨文^[22]，释义比较多，除《左传·昭公元年》中的“五降之后，不容弹

矣”，岳珂《程史·徐铉入聘》“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耶”引申为求得别人允许，主要具有盛受、接纳、容忍、包容之意。能更好地表达“容”之精神内涵的是“和合”二字，和而不同，和合包容，旨在承认不同和差异的前提下寻求相互依存和发展的过程。历史上的中国文化就一直处于多民族的不断交流与融合中，如以赵武灵王进行“胡服骑射”为代表的南北朝民族文化的交流碰撞。和合包容是中华民族从古至今最具有代表性的民族性格和哲学智慧，也成为周边传播过程中对于边界冲突的柔性调适。

韧性系统是一个动态且持续的过程，强调在面临内外部变化、挑战时，具有能够不断适应、恢复并持续运作的能力。^[21] 就如随着丝绸之路的开启与发展、佛教的传入以及宋明时期航海业的发展，中国传统文化与西域文化、印度文化、阿拉伯文化的碰撞必然经历“分歧—磨合—调适—再循环”的过程。这个过程也成为社会与制度、文化与交往的动态交流过程中，诸多元素和合为新结构方式、新事物、新生命的总和。^[13] 中国对外交往的多边立场也彰显出合和包容精神，成为热点问题的解决之道。如在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以及涉及朝鲜半岛、伊朗、缅甸、阿富汗等问题中，以“容”为战略理念的传播交往，强调悬置分歧争议，选择柔性调适的方法，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发挥了韧性系统的建设性作用。

三、“亲诚惠容”在周边传播主流语境中的生产策略

“亲诚惠容”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提出后，《人民日报》即发表题为“升级 提速 加力（国际论坛）”的评论文章。“亲诚惠容”作为新形势下中国周边外交工作的标志性方针如何具体指导外交实践，取得了哪些丰硕成果，又是如何化解矛盾争端，从而得到国际认同的？这一系列问题的答案构成“亲诚惠容”理念在周边传播中的自画像。

本文在梳理了《人民日报》、新华社、外交部网站等媒体机构对于“亲诚惠容”外交理念的

相关报道后，发现对这一理念的报道主题重大、体裁丰富、数量庞大，历时性强。外交部微博平台发布关于“亲诚惠容”的相关内容，主题丰富，更多从外交活动的第一现场视角呈现，并设置#跟我看外交# #元首外交# #外长活动#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等话题标签，同时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微博平台以视频的形式持续发布相关内容。

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中央媒体对“亲诚惠容”实践的连续报道，是对该理念的宣传，也为其他各类媒体定调：坚持睦邻友好，守望相助；讲平等，重感情；常见面，多走动；多做得人心、暖人心的事，使周边国家对中国更友善、更亲近、更认同、更支持，增强亲和力、感召力、影响力。^[22] 在阐释理念内涵基础上形成语境氛围，并通过具体内容构建周边传播主流舆论阵营。本文选取样本量最为丰富的《人民日报》相关报道进行数据呈现和文本分析，对其内容进行解构，以探析“亲诚惠容”在周边传播主流语境中的生产策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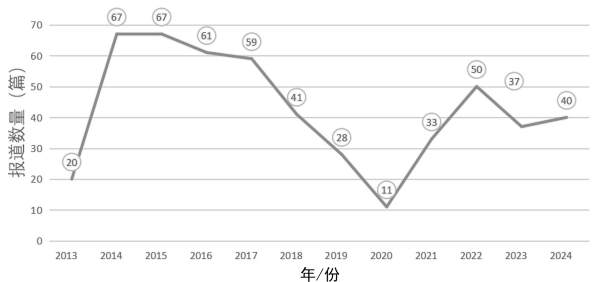


图 1 新闻稿件样本时间跨度与数量分布

1. 报道事件具体多样，密切跟进外事活动

本文共梳理 514 篇新闻稿件样本文章，稿件样本时间跨度与数量分布见（图 1）。“亲诚惠容”在《人民日报》上的 11 年旅程跨越国界、民族和文化，嵌入大国外交各类事务，写进各项合作机制和项目成果，从历时维度为周边国家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了积极的传播力量。同时，《人民日报》对于“亲诚惠容”的报道几乎涉及涵盖了与中国陆上相邻的 14 个国家和 6 个海上邻国，在空间范围上凸显中国发展资源“惠”及周边多国。中亚峰会的举行，中国和东盟积极践行

《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对俄罗斯、越南、缅甸、巴基斯坦、柬埔寨、韩国、印度、尼泊尔进行国事访问和友好访问，中国—阿富汗—巴基斯坦三方外长对话，出席第四次阿富汗邻国外长会，对巴布亚新几内亚、文莱、菲律宾进行国事访问并同建交太平洋岛国领导人会晤等，都是践行“亲诚惠容”的进行时，也构成了“东盟、南亚、巴基斯坦、中亚、俄罗斯”的周边传播版图。

2. 主体视角立体化，构建多种叙事情境

“亲诚惠容”在《人民日报》相关报道文章中，基本是作为方针进行新闻生产，容易陷入叙事宏大、文风严肃的政策性单向传播。但在对样本文章的分析中发现，除了外事活动的客观纪实报道外，立体多元的主体视角被大量运用。如除了元首在大量元首外交报道中作为第一视角外，还有外长大使、新闻发言人、学者评论员以及经济贸易项目中的亲历者、普通人，以此生成对周边外交传播的立体画像。主体视角不仅在公共议题中凸显“亲”和真实感，也让读者跟随主体视角进入叙事情境。叙事情境由若干叙事要素构成，如叙事的方式、叙事人物及叙事聚焦等。^[23]借鉴到新闻报道中，可以引申理解为新闻体裁和主题类型。本文梳理样本文章的报道主题和类型划分，最终归纳合并成 28 类（如图 2 所示）。这些新闻叙事情境建构出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外交场景，也拓展了国际传播的空间布局。

3. 实践议题类型化，强化国际受众认同度

上述新闻叙事情境在实践议题中凸显了类型化。美国社会学者盖伊·塔奇曼（Gaye Tuchman）在《做新闻》中辩证分析了类别和类型化，认为“类别”是依据相关特征进行分析和分类。而“类型化”镶嵌在使用场景和促成其使用的时机当中，因此也从这些场景和时机中获得意义。^[24]在研究归纳的 28 类主题类型中，有一些主题类型并不是专业意义上的新闻体裁和报道的分类，比如会晤会见、主旨演讲、学习问答等。但这些类型化的主题情境对建立国际关系和解决国际问题

至关重要，也建构了以“诚”相待、和合相“融”在相关实践议题中的传播图景，并成为发展中的新闻。另外，《人民日报》多次以王毅外长在元首外交现场的解读和答记者问为视角，进行类型化的创新，还有各国大使不定期的评论文章，周边论坛各国专家学者的现场发言，都从更为客观的角度拓展了类型化中的实践议题，强化了国际受众的他者视角和心理认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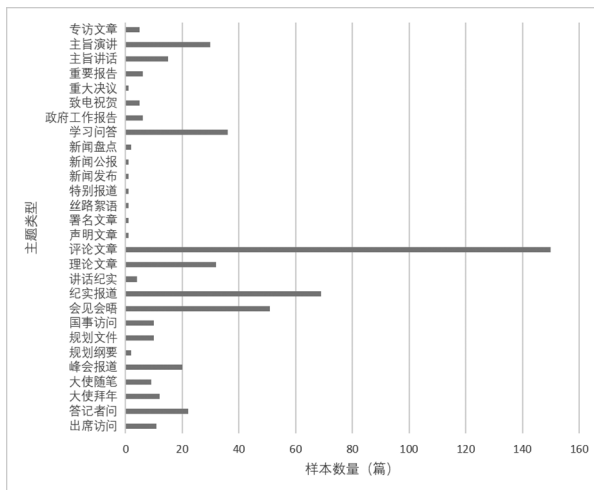


图 2 新闻稿件样本的主题类型与数量分布

4. 观点表达多边化，塑造国际主流话语体系

在众声喧哗的国际舆论场，通常国际传播无效和被动之处在于话语表达和争辩陷入自说自话的独角戏，逐渐丧失有利形势，而沦为被动状态。因此，要提升国际话语影响力，并通过理念表达、行动倡议助推话语势能，塑造国际主流话语体系。在《人民日报》相关评论文章中，就凸显出观点表达的多边化，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共同塑造主流国际话语体系。如“在亲诚惠容理念的推动下，中国式现代化将惠及更多国家和民众（印度尼西亚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中国研究部负责人维罗妮卡）”“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体现了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理念，与亲诚惠容理念一脉相承，为尼泊尔等南亚国家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尼泊尔前副总理兼外长苏贾塔·柯伊拉腊）”等。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哲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又有所递进，秉持全人类共同价值，超越了西方个体本位的人权观，直指国际人权

“治理赤字”^[25]，明确反对国际交往中“中心—边缘”“主体—客体”的旧秩序。^[26] 反观美国、印度、沙特阿拉伯、欧盟在 2023 年二十国集团（G20）峰会会场边签署谅解备忘录，宣布将建设“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IMEC），被有些外媒和自媒体视为是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对抗。但这些被临时发明的新概念不仅没有完整理念作为支撑，且在国际传播话语中更多凸显逆全球化和封锁意味。而“一带一路”倡议、“亲诚惠容”理念以其历时性的发展成果和国际交往实践嵌入“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体系，构建出从周边到全球传播的主流话语体系。

四、“亲诚惠容”给中国国际传播带来的空间拓展

上文选取了《人民日报》为代表的中央媒体作为田野平台进行了文本考察和数据梳理，解构了“亲诚惠容”理念在在周边传播主流语境中的生产策略，既是一个文明理念的国际旅行，又是一个外交理念实践与发展。当然，研究选取的样

本只是一个研究角度，一张概念画像，一份文本和数据爬梳。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看到“亲诚惠容”在“报道—被报道”的过程关系中转化成为各个国家之间的关系网络，通过双边关系、全球交往、话语体系等不同关系向度，为中国国际传播带来更多思路转变和空间拓展。

1. 双边合作关系成为国际传播空间中的耦合机制

“亲诚惠容”理念所聚合的情感共鸣是国际传播的出发点，也是文明交流的落脚点。正如霍夫兰（C. I. Hovland）的研究那样，传播者的说服意图和动机越明确，受众就越容易抗拒说服信息。意图和动机让传播丧失了情感上的共鸣，阻隔了 David Chaney（1986）阐明的共同体中“我们—感觉”（we-feeling）为基础的部分。因此，在从周边走向更远处的国际传播中，以双边关系的定位和表达建构共识，也为国际传播空间中各种要素的拓展建立耦合机制。

表 1 中国与周边国家最新双边政治关系一览表
(截止到 2024 年 10 月 30 日外交部网站公布情况)

国家	双边政治关系	建立年份	国家	双边政治关系	建立年份
哈萨克斯坦	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2019 年 9 月	阿富汗	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2012 年 6 月
吉尔吉斯斯坦	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2023 年	马尔代夫	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2024 年 1 月
塔吉克斯坦	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构建世代友好、休戚与共、互利共赢的命运共同体）	2024 年	新加坡	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	2023 年
土库曼斯坦	全面战略伙伴（在双边层面践行命运共同体）	2023 年	马来西亚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共建中马命运共同体）	2013 年
乌兹别克斯坦	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双边层面践行命运共同体）	2024 年	印度尼西亚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共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	2013 年 10 月
日本	友好合作伙伴关系 战略互惠关系	1998 年 2008 年	越南	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	2008 年 5 月
韩国	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2008 年	泰国	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2012 年 4 月

续表

国家	双边政治关系	建立年份	国家	双边政治关系	建立年份
朝鲜	友好合作	1961 年	文莱	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2018 年
蒙古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2022 年 11 月	柬埔寨	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构建新时代中柬命运共同体行动)	2010 年 12 月
印度	战略合作伙伴	2005 年 4 月	老挝	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构建中老命运共同体)	2009 年 9 月
巴基斯坦	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2015 年 4 月	菲律宾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2018 年 11 月
斯里兰卡	真诚互助、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2013 年 5 月	缅甸	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2011 年 5 月
孟加拉国	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2024 年 7 月	东帝汶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2023 年 9 月
尼泊尔	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2019 年 10 月	俄罗斯	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2019 年

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双边合作关系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等多方领域的交流与合作，而又以双边政治关系的表述为官方定位。研究对中亚 5 国、东北亚 4 国、南亚 8 国、东南亚 11 国及俄罗斯进行了双边政治关系梳理，包括“友好合作”“战略合作伙伴”“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新时代、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等不同双边关系的表述。从表 1 可以看到，除了与不丹没有检索到明确的双边关系定位，其他 28 个周边国家均同中国建立了不同层级的双边关系，并在合作发展中不断提升。值得关注的是，在合作伙伴关系的基础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同时与中国建立了正式性的双边命运共同体。

以双边合作关系的发展作为时间线，贯穿其中的是两国建交以后围绕元首访问、合作交流、战略规划、紧急援助、提案支持等实践内容的不断拓展，以及在具体议题中形成“认同—共识—共情”的系统耦合。在第 79 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中国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共同发展所作出的积极贡献，显而易见得到了多国领导人和与会代表的广泛肯定。在这种耦合机制作用下，双边合作关系又不断提升和发展，通过情感共鸣互相作用而联合起来，从而影响辐射更广阔的国际传播空间。

似乎每个国家对外传播的最终目的都是共识的建构，因此共情思维就是“亲诚惠容”指导国

际传播的耦合机制和空间所在。“亲诚惠容”的提出和落地，既能贯通古今对话，又能开启中西交流：元首外交每一次微笑握手、深入合作都在促成更多交流和对话的机会；在亚太经合组织、博鳌亚洲论坛、G20 峰会、上合组织等周边经济外交中持续传递出敦亲睦邻，诚心诚意；面对巴基斯坦严重洪灾和斯里兰卡经济危机则倾力相助；作为东道主组织召开第三次阿富汗邻国外长会赋能该国经济复苏。共情和认同成为国际交流对话的大前提，打破了原有国际关系中主客体关系的二元对立，建构“主体间性”的共同体关系网，拓宽了国际传播新空间。

2. 元首外交和具身传播成为国际传播空间的网络节点

元首外交是国际传播空间中战略性的主节点。“峰会外交”（Summit Diplomacy）早在 20 世纪中期就已成为西方外交界、学术界和新闻界的流行语，巴斯顿（R. P. Barston）提出现代外交最明显的特点是国家或政府首脑个人外交的作用日益增强这一观点。^[27] 王毅外长在 2023 年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研讨会上对这一年的元首外交情况有这样一段表述：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亲力亲为，主持两大主场外交，出席三场多边峰会，开展四次重要出访，举行百余场会见、通话；从克里姆林宫长谈到广州松园会晤，从“长安复携手”到“同志加兄弟”，从“彩虹之国”的金砖时刻到

“阳光之乡”的亚太蓝图,从“成都成就梦想”到“潮起钱塘江,澎湃亚细亚”。^[28]应该说党的十八大以来,元首外交成为中国外交鲜明特色和亮点,不仅推进双边关系发展,建立战略互信,同时成为国际新闻中的头条热点。因此,元首外交是国际传播空间中的最大主节点。

具身传播通过“身—媒”节点分布嵌入传播空间。虽然也有学者给出了国际传播的路径建设,如外交路径、媒体路径、文化路径、经贸路径等,但仍是单向度的线性模式,并未改变彼得斯所说的“接收对象的空缺”状态,仍以模糊现实的想象和自我投射假装对话。^[29]审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各项访问、会谈、合作,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的连接急剧增多,传播不再囿于媒体渠道,而是分布在现实空间中的各类节点。这也是有学者提出的,具身观视野中的传播是一个在生活世界中因媒介具身实践而实时邀约的各种关系、情境的聚集过程。^[30]如强调对话式、协作式和包容性的“新公共外交”,真正从传授关系上突破了“广播”模式。^[31]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发展就是具身传播的重要实践,“亲诚惠容”理念又在倡议过程中穿针引线,形成了不同的国际传播节点。秉持“亲诚惠容”的具身交往才能促进不同国别人们之间更多的沟通协作,更加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不同于《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的报道,《远方的家·一带一路》大型系列纪实节目已播出300多集,以一个个鲜活的个体和家庭作为宏大叙事中的具身传播节点。如在《巴基斯坦: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一集中,节目组制作人员在当地费萨尔清真寺遇到许多要求合影的当地人,最后节目改变了原有的计划,就用许许多多现场要合影的面孔呈现了略有晃动的10分钟。塔吉克斯坦人帮中国人理发时用手语沟通,中国父子在埃塞俄比亚建设亚吉铁路的家国情怀,保加利亚农户三代同堂的生活,这些人物纪实、平等关系和朴素的意愿将“一带一路”中“身—媒”构成国际传播空间的节点分布,拓展了“自我呈现”向“他者视角”转变的新空间。

3. 元话语成为国际传播空间中的主体符号

现阶段中国在国际传播中的失语问题仍然存在,“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时有发生,西方话语仍长期占据强势地位。^[32]有学者提到“话语”本身就是辨识路径,国际传播呈现的官方话语体系就是国家政治权力的表达。加快构建中国话语体系,尤其是具有全球视野的元话语,是国家主体性建构和国际传播空间扩展的必然要求。

有学者回溯近年来中国国际传播的核心话语,可以归纳为政策、情感和技术三个方面^[33],认为话语研究应当是国家重大战略与话语策略的结合。也有学者提出打造中国元话语,因为在国际传播语境下,元话语能够帮助受众按特定叙事框架理解国际话题相关的信息、意见、情感或行为,是讲述国家故事的“开场白”^[34]。中国在国际传播中的话语符号,更多是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典型代表,如京剧、瓷器、中国功夫等。这类话语内容在传播过程中虽然“言之有物”,但缺乏体系化、理论化,长期重复也容易成为中国的刻板印象。

正如前文所述,结合“亲诚惠容”作为一个理念在主流语境中的旅行,其话语内涵符合人类社会的共同利益,其话语外延在行动层面不断进入国际传播实践。这可以看作是具有全球视野的元话语,且一环环地扩散拓展,汇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元话语体系之中: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俄罗斯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会议厅演讲);要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的总目标(党的二十大报告)。

4. 民间声音成为国际传播空间中的建设性力量

几年前德国汉学家曾在媒体上披露,德国舆论中的中国形象有所恶化,这与中国在美国舆论中的形象密切相关,甚至有具体人员受英国广播公司(BBC)的资助对新疆做一些“研究”,“看看中国一方面在做什么,再看看中国的外部舆论形象,我们会发现有很大的落差”^[35]。这位德国

汉学家在国际传播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代表了非官方的民间声音在不同国度的政治、社会、文化及思维方式中扮演了“桥梁建设者”，一定程度扭转了“他者”眼中的中国形象。“亲诚惠容”从主流语境走向民间话语，才能有效拓展国际传播空间的主阵地，民间话语是国际传播中真正有建设性的力量，当然此处的“民间”更多指向政府和主流媒体之外的传播主体，以及他们与官方主流媒体的主体间性。

一是注重官方传播身份的转换。在现代话语理论中“辨识”与“秩序”相关，不同的传播身份会带来不同的辨识性和关注度。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赵立坚等为代表的官方工作人员都注册有海外个人 Twitter 账号且拥有非常高的关注度，赵立坚成为外交部发言人之前就已经是一名响当当的“网红”。这样非官方身份的巧妙之处在于既有不是官方胜似官方的权威度，又能以个人视角和多元化语言对官方声音进行解读和传播。二是民间话语进入国际舆论场。如在涉藏、涉疆及意识形态等敏感问题上，仅依靠来自官方层面的输出往往效果不理想，甚至还会产生事倍功半的结果，此时若有适宜妥帖的“民间声音”，那么解决上述尴尬而棘手的国际传播问题便有了全新的路径指引。^[36]从另一个角度看，国际舆论场也需要网民情绪的真实表达，这里的真实不仅指声音真实，更需要认知真实。例如，“TikTok 难民”涌入中国，信息茧房被冲破，就是一次关于认知真实性的大拆解。三是双向互构中形成再建构。国外的政府、媒体和民众往往对来自中国官方的意见表态存有异议，一些媒体和组织非但会作不正确报道，甚至还会有意对中国污名化。面对这样的问题，除了官方传播身份的转换和民间话语的进场，更需要探究双方的互补配合战术、官方权威声音的建构和定调以及民间话语体系的阐释与弥合。互为补充的建构与再建构才是二者共同构筑中国国际话语平台、拓展国际传播空间的实践形态。

五、余论：国际传播的“国际化”

从全球范围来看，全世界有 200 多个国际关系行为体，涵盖了 2000 多个民族，世界是一个多

样性的社会。^[37]“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是人类社会争论不休的永恒命题。本文从影响国际传播底色的文明观出发，认为对亨氏和米勒的学术观点都不应该进行单一的理解和片面的引用。文明冲突还是文明共存，关键是从何种动因去思考，从何种逻辑去解读。在当下多文明的全球政治中，“亲诚惠容”作为中国外交理念，从传统文化积淀发展而来，通过周边传播的战略构建及其在主流语境中的生产策略，有效拓展了中国的国际传播空间，并以历时性推动融入“人类命运共同体”哲学思想体系。在两个理念共振作用下，中国生发出了一系列国际传播议题和具体内容，其传播主旨和话语逻辑都清晰可见，成为大国外交的坚实底色。国际传播要秉持世界主义精神，从传播本身的实证主义和在地经验出发。

网络空间的出现，是国际传播和全球交往的又一次范式革命。无限开放、实时互联让“交往”更注重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建立和情感联结，这也让国际传播需要打破以国家为主体的既定思路，思考更多维度的主体性和主体间性，以此进行空间拓展和策略提升。不同国家各自文明发展的进程不同，随着市场经济的全球扩张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打破了人们在交往中用祖先、宗教、语言、习俗和体制来界定自己的身份认同，但跨越地域、国家、民族，文明各种物理空间和精神空间的交流对话又并非易事。如米勒在《文明的共存》中说到的，我们更需要看到当今世界“非同时性的同时性”，认为这是由全球化的强烈过程而引发的。因此，本文认为任何一种国际传播的理念、视角和方法都应该在国际社会主客交融、互相渗透的多重现实中加以考量和洞见。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宣传部.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 [M]. 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4：152.
- [2] [美] 弗朗西斯·福山. 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 [M]. 陈高华，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3.
- [3] [美] 塞缪尔·亨廷顿.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M]. 周琪，等译. 北京：新华出版社，2017：45.
- [4] [美] 弗朗西斯·福山. 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

到法国大革命 [M]. 毛俊杰, 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171.

[5] 陈建洪. 论美国霸权秩序理论的两种版本 [J]. 当代中国与世界, 2022 (3): 104.

[6] [德] 哈拉尔德·米勒. 文明的共存——对塞缪尔·亨廷顿“文明冲突”的批判 [M]. 红那浪, 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2: 2-4.

[7] 阎学通. 数字时代的中美战略竞争 [J]. 世界政治研究, 2019 (2): 40-41.

[8] 李武林, 谭鑫田. 西方哲学史教程 [M].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1987: 91-93.

[9] 曹卫东, 张广海. 文化与文明 [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4-7.

[10] 徐旭生. 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 (增订本) [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60: 19.

[11] 阴法鲁. 中国古代文化史: 插图本 (下)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790-793.

[12] 方楠. “互联网时代的新差序格局”——微信圈层场域中社交结构与关系格局的变迁与重组 [J]. 河北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0 (1): 38-40.

[13] 李学勤. 字源 [M].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12: 658.

[14]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政策规划司. 中国外交 (2015) [M].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5: 25.

[15] 环球网. 周边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合作抗疫中发扬光大 [R/OL]. https://www.sohu.com/a/416886684_162522

[16] 张岱年. 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 100-101.

[17] 戴逸. 18 世纪的中国与世界: 导言卷 [M]. 沈阳: 辽海出版社, 1999: 101.

[18] 李华锋. 论中国外交观的传统文化渊源 [J]. 东疆学刊, 2004 (1): 101.

[19] 人民日报. 中国成为 15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 [R/OL]. 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410/content_6978504.htm

[20] 王庆林, 亢升. 文明核心国家在东亚秩序重构中的价值——道义现实主义在东亚 [J]. 国别和区域研究, 2019 (1): 97.

[21] 周敏, 郅慧. 理解“韧性”: 中华文明国际传播的现实取向, 要素耦合与逻辑理路 [J]. 中国编辑, 2024 (6): 55.

[22] 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亲诚惠容 [R/OL]. [tp://theory.people.com.cn/GB/n1/2017/0906/c413700-29519658.html](http://theory.people.com.cn/GB/n1/2017/0906/c413700-29519658.html)

[23] 罗钢. 叙事学导论 [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4: 158.

[24] [美] 盖伊·塔克曼. 做新闻: 现实的社会建构 [M]. 李红涛,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2: 56.

[25] 陈拯. “话语势能”构建与国际话语塑造 [J]. 中国社会科学, 2023 (12): 165.

[26] 宋奇, 李智.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社会组织国际公共传播研究 [J]. 现代传播 (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22 (12): 58-60.

[27] 胡勇. 中国元首外交的兴起——一种国内政治的考察 [J]. 外交评论 (外交学院学报), 2009 (8): 43-44.

[28] 外交部官网. 王毅: 元首外交铸就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丰碑 [R/OL]. https://www.fmprc.gov.cn/web/wjb_673085/zzjg_673183/xws_674681/xgxw_674683/202401/20240109_11220454.shtml

[29] 曾持. 反思交流的幽灵困境——论彼得斯的《对空言说》[J]. 当代传播, 2021 (2): 25.

[30] 张文娟. 具身传播研究: 一种作为观念的元范式变革 [J].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6): 80-89.

[31] James, P. (2013). *New public diplomacy in the 21 century: A comparative study of policy and practice*. New York: Routledge.

[32] 冯莉, 丁柏铨. 提升国际舆论引导和国际舆论斗争效能研究 [J]. 新闻爱好者, 2023 (2): 4.

[33] 王沛楠. 政策, 情感与技术话语: 2024 年国际传播的热点议题与研究方向前瞻 [J]. 对外传播, 2024 (1): 36-37.

[34] 许向东, 丁兆钰. 中国式现代化元话语的建构及其国际传播 [J]. 对外传播, 2023 (9): 9-12.

[35] 参考消息. 德国汉学家揭露: 西方媒体抹黑中国有哪些套路 [R/OL].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12948187393647467&wfr=spider&for=p>

[36] 杨奇光, 常江. 搭建中国国际话语平台的民间力量及其实践路径 [J]. 对外传播, 2017 (5): 8.

[37] 高仓健, 梁钦.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价值与推进路径 [J]. 齐齐哈尔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11): 6.

[责任编辑: 高辛凡]